

■ 聚焦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变迁图景中的乡土众生

□ 马 顿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写的是晋南一个小村子“南无村”的变迁和村人画像。谈《众生之路》，总免不了会拿它与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来作对比与观照。二者首先一点的区别在于，《母系氏家》重点写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女性人物，是母女、婆媳一家两代女人的人生故事，角色限定范围较小，叙述重心也在于家庭之内；而《众生之路》则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暗线，塑造出了在此背景下的比较完整的乡土众生群像，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性和一定的乡土变迁史的意义。

我们可以给《众生之路》中的人物略作一个统计分类。这些人物的身份都是农民，但他们在村里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本身的身份特征也有所变化。比如以庆有、铁头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农民，在务农之余，还在外打工挣钱；以云良、连喜为代表的乡村能人，有能力、有办法开办榨油厂、纸箱厂，并招募村人进厂打工，他们扮演着乡村经济的领头人；以银秀、嘉成、天平为代表的村干部，都深入地参与了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的营造与改变当中；以二贵、兴儿等为代表的病弱群体，又各自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照出了周遭一切人的嘴脸，照出了人情冷暖；还有以兴儿爸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坚守家园、土地亦即惯常的生活方式而不可得，等等。

最初的时候，乡村生活除了农忙时节大部分时候都还是舒适惬意的，于是，故事的叙述语调就比较舒缓，人物的行为也着重于劳作之外。比如学书跟着庆有偷瓜和学书打银戒指两节故事，便如散文一般，总体上细节大于情节，合乎旧日乡村的气质，值得慢慢品味。然而，同时作者又很注意在舒缓

之中加入起伏。比如，学书不再担当后方“放哨”的任务，而是跟着庆有深入青纱帐“前线”去偷瓜，本来庆有从来都是用自己的镰刀，这次却嫌自己的刀把短了，要用学书的镰刀钩西瓜。这一情节，按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有心的作者这么穿插一下，既可增强故事的动感，又可以使学书这个人物在事件中融入得更深。又如，将打银戒指跟父母在雨前抢施化肥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变量和曲折度，同时又是对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一个响应，因为父亲认为在下雨前施肥效果好，是“科学种田”。

在“科学种田”兴起的同时，外界的经济新风也吹到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在小说中，其表现一是大组合柜的流行，二是专业户的诞生。“十组合”成就了福娃这个新时代木匠的发家史，工厂解散车队搞承包带来了二福紧接而来的风光。这兄弟俩，算是早期的乡村能人。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他们的角色很快便为云良、连喜所替代，而且是升级换代。到了这个时候，作者对于乡村生活和人物心理的细节描摹便省了些笔墨，而故事相对密了起来。

有了云良、连喜这样的乡镇企业家，便有了庆有、铁头这样在工厂打工的新农民，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初期农村土地改革动力对于土地的增值能力的减弱，更有了远离乡土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出外打工的多了，没年轻的帮忙，就开始花钱聘请专业的理事会来操办红白喜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乡土之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乡里关系。再而后，当连喜这样的乡村创业者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又开始对政治地位有了需求，从而又牵出了乡村政治生活中不成熟的民主试验。

本土创业者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世界是平的”，很快域外经济就把触角伸进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当经济大雪球轰隆隆地滚过，终于，到了最后，竟然将庄稼地乃至村庄都连片粘走了。韩国工业园在南无村征地，村子在短暂的兴奋与颤栗之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村民集体搬迁，做了城里人。只有老农民兴儿爸一个人还在留守，并勾起了出售南无村的经手人、最后一任支书银秀失地后的剧烈乡愁。

其实，整部书在叙述语调上一直都是舒缓的，作者似乎是有意借此来延缓对于田园生活的惬意回忆的消逝，是出于眷恋。而整部书，正反映了作者回不去了的心伤，以及立此存照的惜别之情。就像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所唱：

归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除去在社会性上比《母系氏家》更加开阔和丰富之外，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众生之路》也比《母系氏家》有了更为完整的体现。《众生之路》给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活着的路，一条是死去的路；活着的路又分为活得好和活得不好的路。在《众生之路》中，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人用非正当的手段攫取利益，许多人的身体与心智乃至道德良知都有了残缺，甚至出现了儿子结婚老子死、东家的丧事尚未完毕西家又有人服毒的情节安排。可是，作者同时又没有刻意地地悲剧化，也不特别地淡化，只是那么样地呈现了出来。或许，其原因正如作者在书末借学书之口所说：“都是乡人啊，死了那么多人，我怎么就没有悲伤了呢？我什么时候失去了那颗淳朴的心？”然而，这种情感的迟钝，又何尝不是见惯不惊的结果呢？在经受着经济的、观念的冲击的小小南无村，一个



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残了，或者沦落了，直到最后全体失去了家园，这既是生命力的离散与破碎，又象征着乡村的败落。当经济社会的发展鼓动起人的各种生命欲望，并且打开一扇可以实现他们欲望的大门的时候，一方面，它必须持续地为他们鼓气，另一方面，这欲望又会对社会伦理与他们秩序形成反噬，就是在这一鼓一嘘之间，田园旧梦不再。

在所有人物当中，二贵是走向死亡最突然的一个，他不是横死，也不是自杀，而是得了胃癌，他走在断头路上，向众人作了最触动人心而漫长的告别。最后，当南无村的村庄、耕地都被征用之后，已经有名无实的支书银秀也作了一次漫长的告别，但那是对于土地的依依不舍。他跟最后还在坚守的兴儿爸一样，根子上都是农民。这一共性，决定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共通性。

■ 评 论

《熬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 梁 海

老藤的小说《熬鹰》由4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小说开篇拦腰起笔：“尚在金榜题名亢奋中的郑小毛，到庙西镇报到那天，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他被主管人事的副书记老胡告之，马上到白狼河源头的金花山村挂职村委会副主任，为期一年。”将故事的起始直接切入或变成了一个故事发展的动机，并为以后的叙述提供了无数的可能。

由于父亲逼迫而考上公务员的郑小毛，刚刚上任就被派到全镇最偏远的金花山村挂职锻炼一年，郑小毛的怨愤可想而知。为了让郁郁寡欢的郑小毛重振信心，金花山70岁的老支书金兆天给他讲了老范、老皮和师长有关熬鹰的三个故事。一介书生老范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金花山村劳动改造，整日怨天尤人的老范在金兆天的劝说下开始熬鹰。在经历了熬鹰磨砺之后，他明白了“熬，就是磨去锐气和戾气，在人和鹰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此与金花山的父老乡亲打成了一片。老皮本是八级钳工，在“文革”中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发配到金花山。同样通过熬鹰，老皮懂得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从此重振信心，开始新的生活。师长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英雄，位高权重，颐指气使。但在与金兆天比赛玩鹰后，也豁然开朗，洞彻人生。老范当了大学校长，老皮去美国做了工程师，师长也被“熬”成了部长。

老范、老皮、师长的三个小故事相对独立，如同俄罗斯套娃，套扣在郑小毛的故事中。然而，老藤似乎偏偏要挑战读者的阅读惯性，他安排了一次精巧的回转，郑小毛熬鹰与老范、老皮、师长不同。或许是金兆天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给予了更多的期待，他带着郑小毛上山去捕“他还从来没捕到过这种翼展比人都高的”、被称为“风鹰”的金雕。捕获风鹰的过程出人意料地艰苦卓绝，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大大削弱了金兆天的气场。“金兆天性格大变，无论郑小毛怎么说，他都不再进山捕鹰。他烧掉网具，卸掉西屋挂了几十年的小秋千，金盆洗手不再熬鹰”。故事这样的结局极具颠覆性，这是金兆天对自我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老

《大道留真》：别开新体，传神立人

□ 丁晓原

作品由一张宋玉麟和父亲宋文治在1951年的留影进入到“水乡之忆”，而这部分访谈的首问“你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正是由此而来，自然而悠然地牵出传主的忆语。这样的人题十分巧妙地奠定了传主自身独特的人生与艺术发展的逻辑，又牵引着整部传记许多富含故事性的人物叙事：“拍这张照片6年后，宋文治先生进了正在筹建中的江苏省国画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画家；再过了26年，他成为了画院的副院长。”而宋玉麟“在28年后，也循父亲之路，进了江苏省国画院，以后又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在中国美术史上，父子(女)相袭成为画家者众，皆为名家者少，而同宋家父子”这样的情形，则“鲜有所闻”，“这张照片是艺术家的重要印证，也可看作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经作者这样的解读，读者对传主特异的人生故事产生了期待，而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具体地蕴含在作者与传主的访谈以及作者的叙说和论述之中。

范小青在该书的序中指出，这本书的风格“新意盎然”，这种“风格”正来自作品另开一面的别致写法。第一部分的访谈，读者从家常式的聊天中，分享着艺术家的人生精彩。而第二部分“大道留真——宋玉麟先生艺术道路简论”、“故意新貌——宋玉麟先生细笔山水”和第三部分“意趣之美——宋玉麟先生的花鸟画”、“自由心境——宋玉麟先生的书法”、“风景旧曾谙——宋玉麟先生油画、水粉画”等，又是一种写法，换了另外一副笔墨。如果说第一部分故事访谈主要是纵向勾画出传主重要的人生站点，那么第二、三部分则主要是

范、老皮、师长们所“熬”出的苦尽甘来的质疑。小说的结局，虽说是情理之中，却绝对是意料之外。老藤为年轻的郑小毛安排了另一条出路。郑小毛不再熬鹰，而是在金陵凌空翱翔的雄姿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辞去公职，放弃了世俗眼中的“高干”，偏偏要在平地上走得高远。

郑小毛最终走上了一条自由的、能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生活路径。金兆天的“熬”代表着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和抱负，但同时也会导致对人性的摧残；郑小毛的“熬”则重在个体外在的生命实践与内在精神的交融。小说的结局蕴藉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与当下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它是否需要现代化的转换？这个转换的途径又是什么？这其中裹挟着些许无奈、惆怅和悲怆，但在新生代郑小毛的身上又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一种呼啸而来的生命活力。可以说，小说的可能性，是仰仗生活的可能性的。我想，或许这也恰恰是老藤小说的魅力所在。

作者既能入乎其中心感，又可出乎其外观照，以其富赡的养学和灵颖的感悟，抵达画家的心灵本真和艺术创造的独特。在和平看来，宋玉麟的艺术个性具体体现为“用‘心’写出古典之美”，“用‘细’写出优雅之美”，“用‘情’写出人文之美”等，这样的言说可谓知人之论。这种纵与横的构架使整部传记感性的叙说与学理的论述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相生相成、浑然一体。

传统的传记书写方式较为单一，基本上只是语言文字的叙述。我们读《大道留真·宋玉麟》，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精美，最初吸引读者的是其中精美的画作和珍贵的照片，使这部传记更具文化性和可读性。照片、图片之于《大道留真·宋玉麟》并不是一般地作为插图增加视觉效果，而是成为一种具有特殊表现力的图像语言。穿插于文字表述中的照片，或为传主人生行旅中站点提供了现场情景，或对艺术家创造具有重要关联的人与事作了具象再现。最为悦目可心的是那些体现了艺术家宋玉麟绘画书法特质特性的代表作，数十件作品姿色百生、气韵可感，其间流动的色彩线条、跳跃的韵律意味，美不胜收。文字语言和图像语言的有机融合相生，既尊重、满足了读图时代读者新的阅读需求，更本真地反映了传主宋玉麟艺术创造人生的“形”和“神”。

■ 新作快评 高艳国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中国作家·纪实版》2016年第4期

何处安放逝去的灵魂

□ 汪守德

当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之时，走进和平阳光之下的人们无不庆幸自己躲过了刀光剑影。然而战后的一切似乎并不会完全归于寂静，留给人们记忆的将会有种种难以平复、难以忘却的隐痛。那些在战火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浴血征战的军人们，或在战场上迎着枪林弹雨轰然倒下，或蹉跎烽火硝烟从此步入平淡寂寞的生活，都在战后给人们提出这样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善待每一个曾经喋血疆场、为国征战的将士？那些千千万万逝去的老兵之魂是否都得到了应有的安放？

高艳国、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通过力透纸背的叙述，让我抵近地认识和了解了三位面容沧桑、大义在心的国共老兵。他们满怀无尽热忱，历经重重困难，执著而孤绝地为那些至今仍无所归依、依然漂泊的老兵之魂寻找安放之所，令人不能不对之产生莫大的敬意。两位作者为某种使命与激情所驱使，看重、投身和专注于这一题材的开掘和写作，以可贵的耐心和热情戮力完成这部体现沉思、大爱与良知的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思考力。

《中国老兵安魂曲》既是一部内容厚重、振聋发聩之作，也是一部激荡心灵、发人深省之作。它引领我们从今天站立的时代经纬点出发，回看和记忆那些应当回看和记忆的历史和人物，进而审视我们当下已经变得有些荒芜漠然的灵魂。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作品中三位分别来自山东、山西、台湾地区的老兵，在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或生活的年代，或经受过血与火的无情洗礼，目睹过战争的惨烈；或因所亲历的种种见闻，深知战争与军人的固有内涵，珍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感情世界更加炽烈、真挚和纯粹，他们对战争的牺牲者和幸存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深厚情感，更珍视老兵的牺牲，更看重亡灵的安妥。这是与远离战争，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的人们所可能具有的平淡与漠然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都是因为某个偶然事件或场景所触发才走上这艰难漫长的安魂之旅，如王艾甫在古玩市场意外发现未发出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高秉涵作为同乡中的年纪最小者受老兵们带骨灰回乡的托付，老家的三座无名烈士坟墓激发了郑沂家的感恩之心，萌生出为烈士寻找名字的愿望。几十年里，他们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为烈士、为老兵们安魂，抚平历史和战争的伤口，他们的义举、善举甚至是壮举动人心扉，感佩天地，显出的是他们精神与人格的非凡与伟大。

作品中，我们真切地认识到，每一个战斗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连接着一个具体的家庭和亲人。战士冲锋时倒下只在顷刻之间，这种生命在瞬间的消失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哀伤与思念，及时获悉噩耗的自然会悲痛欲绝，而那些杳无音信的牺牲者的家人们常常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盼望、守候和等待。作品最为动人的莫过于老兵魂归故里的那一刻，当那些绝望的亲人们从历史的缝隙中重又得到确切的消息时，那种猝然而至的哭天抢地；当那些曾经的烈士魂归故里时，望穿双眼的亲人们却早已凄然离世，而他们的故土已无人守望，只有远远围观的乡亲……

这三位为亡者安魂的贤者和圣者，完全是凭着对烈士、对友人、对为国征战的珍重，以微弱的力量进行着苍茫的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若让殇者和逝者魂归故里。期间经历多少的艰难与曲折，非亲历者难以想象和共诉的。每一次成功的寻找，能够给这些安魂者以多大的快乐与宽慰，相信也是难以形容与言表的。从他们的身上，作者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英烈不改的敬仰与崇尚，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不变的精神气质与境界。但同时，作者又下笔凌厉直书其事，将高秉涵、王艾甫、郑沂家在为老兵安魂过程中所遭到的种种冷遇、猜疑乃至刁难和盘托出。这无疑是对不作为、傲慢与冷漠的针砭和拷问，作者的写作意在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和漠然的内心。

《中国老兵安魂曲》以梳辫子的方式和非常精细的笔墨，交替进行三位主人公的叙事，形成一个互相映衬、互可参照、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三位主人公虽处在不同的时空，却体现了情怀与精神的同构，体现了共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作品以极富张力和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历史与人生的热烈与凄凉。此外，我们时时被作品的情怀和思想性所穿透，作者时时站在今天的角度，站在超越战争和政治的角度发出沉重的无奈和无限的期待，这或许是在告诫人们，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民族，一个要向前走很远的民族，一定要有宅心仁厚和更加宽广高远的胸怀，一定要有“敬仰英烈、崇尚英雄”的传统，让牺牲真正成为轰轰烈烈的壮举，成为全民族永远的铭记和祭奠。